

中国经济问题

CHINA ECONOMIC STUDIES

ISSN 1000-4181

CN35-1020/F

- 满足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沈 斐
- 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孙文杰 严文沁
- 农业转移人口跨城市职业流动与公共服务获取研究
赵海涛
- 官员“跨务型”交流与任职绩效
褚 剑 陈 骏
- 里谈巷议：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存在邻里效应吗
岳 华 王海燕 张沛莹
- 乡城人口迁移与流动儿童教育获得
肖利平 刘点仪

2021年11月 第6期
总第329期

中国经济问题

ZHONGGUOJINGJIWENTI

(双月刊)

一九五九年创刊

主 编 傅十和 周 文

常务副主编 张兴祥

副 主 编 柏培文 陈勇兵 梁若冰 王艺明

编辑部主任 宋 涛 副主任 莫长炜

英文编辑 许梦涵 杨子砚 祝嘉良

编 委 (按照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鲍小佳 陈 工 陈海强 邓 明

郭 晔 韩 乾 黄娟娟 黄寿峰

李 锴 李梦玲 刘 晔 刘鼎铭

刘根荣 茅家铭 孟 磊 牟敦果

倪晓然 彭水军 潘 越 任 力

孙传旺 王 云 谢贞发 许 莉

杨 曦 岳 阳 张 宇 赵西亮

郑挺国 周颖刚

目 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满足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沈 斐 (5)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 陈晓枫 钱 翀 (19)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我国通信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溢出的视角 孙文杰 严文沁 (33)

稳定城市化与收入不平等

——基于随迁子女教育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刘 欢 (47)

农业转移人口跨城市职业流动与公共服务获取研究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 赵海涛 (61)

政治周期、官员任期与房地产投资 陈 卓 陈 杰 陈 健 (75)

官员“跨务型”交流与任职绩效

——来自审计官员地方主政经历的经验证据 褚 剑 陈 骏 (89)

新农保是否使中老年人生活更幸福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赵一凡 周金娥 (105)

农民减负与农产品出口质量提升

——基于2002年农业税改革的研究 徐晓辰 王 松 孙楚仁 (123)

里谈巷议: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存在邻里效应吗

——以农村村落为样本的经验分析 岳 华 王海燕 张沛莹(140)

企业诉讼、信号传递与融资约束..... 司海平 陈舒欢 苗 妙(156)

金融科技、媒体情绪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傅利福 厉佳妮 方 霞 马 丹(169)

乡城人口迁移与流动儿童教育获得

——基于教育质量的视角 肖利平 刘点仪(182)

学术会议与公告

经济波动与增长学术研讨会 2022 年活动预告..... (104)

《计量经济学报》首届“大数据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文本数据分析及其应用”

研讨会征文启事 (168)

《中国经济问题》2021 年总目录..... (197)

《中国经济问题》2022 年度重点选题计划 (199)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

陈晓枫 钱 翀

内容提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审视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的破局之策和指导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应厘清其理论渊源及其运行机理,明确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和任务,以便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实践策略。

关键词:经济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渊源;马克思再生产理论

DOI:10.19365/j.issn1000-4181.2021.06.02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济结构正发生历史性变化,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出现常态化萎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2020)的重大战略抉择^①,并在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应对当前全球经济下滑、经贸摩擦加剧和疫情蔓延等不利形势的破局之策,也将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中国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思想史的视角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本规律和运行机理,对深入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加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二、马克思对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理论阐发

(一)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奠定了经济内循环的分析基础

魁奈在《经济表》(魁奈,2017)中开创性运用的抽象法,从社会总产品出发的分析视角,对社会总产品的归类 and 分解,用图表的方式分析再生产,以及用类似“血液循环”的理念去解释经济运行过程

收稿日期:2021-05-17

基金资助:本文获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省科技厅创新战略软科学研究项目(2020R0042)的资助。

作者简介:陈晓枫,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翀(通讯作者),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温州商学院金融贸易学院,副教授。

①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等,这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斯密、李嘉图继承了魁奈的成果,也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使其无法科学阐明社会资本再生产研究的对象及其基础,因而不能在理论层面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如何实现物替换和价值补偿问题。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科学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

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首次系统阐述了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指出社会再生产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环节所构成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而“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总之,社会再生产是一个内部各环节(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受魁奈《经济表》的启发以及对其错谬之处的深刻洞悉,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连续绘制了4幅经济表(马克思和恩格斯,2019a),形成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总体框架。马克思的经济表首先从产品最终用途的角度用高度抽象的方法将形式多样的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活资料、机器和原料两大部类,由此,纷繁复杂的社会生产就可以被区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继而,马克思从劳动的二重性和剩余价值理论出发,将各部类的产品和社会总产品都从价值构成上划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再由抽象到具体,回归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剩余价值的具体形态,把利润分解为企业主收入、利息和地租等。虽然马克思最终选择以公式的形式替代了经济表的形式来阐释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但必须承认的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所绘制的经济表已构建出了其社会再生产理论近乎完整的框架雏形。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也即是,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必须有序衔接,并循环重复,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停止都会导致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断。因此,从联系和发展的视角来看,这一阶段正在进行着的社会生产过程,相对于上一个阶段来说,同时又是再生产过程。这在任何社会形式中都是一样的。由此,马克思点明了循环是社会再生产内生的、必然的属性,这是对魁奈启蒙性的经济循环思想本质上的升华。紧接着,马克思又指出了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

承接《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初步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以及产业资本伴随其形态变化的循环与周转,都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得到了非常细致的解析和阐述。从具体的分析逻辑来看,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对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循环的微观分析入手,逐渐扩展到对单个资本交错运动的有机整体——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宏观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微观经济循环的分析到宏观经济循环的考察。马克思沿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经济表中的划分原则和方法,依据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原理,在实物形态上,将社会的总生产分为第Ⅰ部类(生产资料)和第Ⅱ部类(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在价值形态上,则分为 c (不变资本)、 v (可变资本)和 m (剩余价值)三个部分。实现价值和实物的双重补偿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两大部类内部和之间的交换则是实现方式。为此,两大部类生产必须保持平衡。简单再生产要求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产品生产的基本比例关系是“ $I(v + m) = II(c)$ ”;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则要求“ $I(v + \Delta v + \frac{m}{x}) = II(c + \Delta c)$ ”,公式中的 Δv 、 Δc 和 $\frac{m}{x}$ 分别为从上一年产品中分离出来的用于追加的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由此可见,社会总产品能否在原规模上顺利实现,取决于两个部类之间能否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如果是扩大再生产,积累也必须保持比例协调,这是保持经济循环顺畅所必

须遵循的规律。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及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绘制经济表并提出分析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全部条件,再到《资本论》中社会再生产的循环思想、循环条件和循环机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一国经济内部顺畅运行的一般条件和客观规律(张衍,2017),由此构建起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也是分析经济内循环的理论基础。

(二) 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观点和阐释提供了分析国际经济循环的逻辑主线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循环的思想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也没能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紧密结合而融为一体,但他散见于诸多著述中的观点和阐释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启迪性。马克思制定的“六册结构”计划就包括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虽然这两部分内容并未完成,却体现了他对国际经济运行的关注。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所认为的“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这一观点时指出,“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也就是说,生产工具的发展促进了分工的发展,生产工具和分工的相互促进使得大工业走出国门,通过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融入世界市场。因此,国际交换、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实际上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一个国家自己不能把资本积累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机器生产出来,它就要从国外购买。如果它自己不能把所需数量的生活资料(用于工资)和原料生产出来,情况也会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2008)。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了国际交换(国际贸易)对于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重要作用。实际情况亦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有新的生产设备、原材料以及生活资料等物资的投入,但这些物资并非都能在国内生产或足量地生产,缺乏和不足的部分就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取。从这个角度看,国际贸易本身已成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突破国内资源和生产力限制的重要条件。并且,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剩余价值实现中,原先作为国内市场的补充的国际市场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剩余价值的实现也愈发具有国际性。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国际贸易也因此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使用,利润率就会提高”(马克思和恩格斯,2003a)。这就如同企业实现超额剩余价值的路径,即采用尚未普及的新技术、新设备,使个别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企业。相对于社会价值,其所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也因此而更低。在此情况下,当该企业以和其他竞争者同样的价格,甚至是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时,仍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阐明了,经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对外贸易中取得优势,获得较高的利润,是因为拥有了更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由此可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并在国际分工、交换和竞争中取得经济优势的根本之所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b),“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b)。一部世界史表明,资本对剩余价

值的追求是内在动因,其不断驱使着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开拓新的市场,销售更多的产品,获取更高的利润,进而实现资本快速且持续性的价值增值。由此而形成和发展的世界市场,打破了原先的区域封闭状态,消费开始突破国界,产品已不再局限于满足一个国家的内部需求,对外出售日趋常态化。与此同时,生产的分工也遵循资本的要求并按照各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扩大到世界范围。于是,生产、交换和消费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各种资源、要素也在全球自由流动,国际分工与协作不断深入,生产全球化、消费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各个国家和民族,或主动或被动,或迟或早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循环,各国之间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交织成为必然。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显现出了一条清晰的国际经济循环的逻辑主线: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分工国际化—国际分工和大工业形成世界市场—国际交换成为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新条件和资本积累的新途径—发达国家以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利润)—世界市场上剩余价值的差异化分配又反作用于工业和资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最终各民族自给自足的状态为相互交往和依赖的关系所取代,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融互促,如此不断循环发展。

三、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发展实践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真理,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科学理论的实践指导作用。毛泽东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根据中国的情况和特点去联系、应用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代主要领导人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循环理论,从各个时期中国内部国情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出发,提出了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与政策,产生了具有时代影响力的新观点、新理念,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不断焕发新生。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处理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上,在以下几个时期确立了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实施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我国经济内外循环的主次地位、联结机制以及主要问题也随之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一)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自力更生发展内循环为主,争取外援借力外循环为辅

内部经济运行亟待恢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外部面对美国和前苏联的全面封锁和压制,甚至在某些历史时间段两个国家同时的叠加强制,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回避的现实情况。如何立足实际,迅速发展经济,将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依靠独立自主,发掘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毛泽东在1945年就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毛泽东,1991)。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毛泽东,1999)。为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战略举措。国家集中并统一分配资源,以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支持工业化发展,构建起了“有形之手”主导下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

外循环方面,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1958年6月,毛泽东批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泽东,1999)。这是根据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所确立的内外循环的主

次地位和发展关系。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初期对外经贸最主要的发展对象,后逐渐强调发展同一切国家的经贸往来。同时,重视发展港澳等地对外经贸的重要“窗口”作用,以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援助合作为主要方式,换回我国急需的重要物资和外汇。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时间内,我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建立起了较为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内循环经济体系,同时于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助力国内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总体成效十分显著,完整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工农业产值大幅提升,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是,一些问题也并生出现,以农补工导致了产业结构失衡,计划经济的体制压抑了市场活力和消费需求,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逐渐凸显。

(二) 改革开放时期(1979—2019):以改革激活内循环,以开放联结外循环

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1993)。要使国家走向强盛,人民富裕起来,充分发展市场经济是无法逾越的阶段。实践“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邓小平,1993)。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1993),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孤立地搞发展。大胆地吸纳世界市场上相对过剩而我国又迫切需要的经济要素,快速提升综合国力,这就是邓小平以开放联结经济外循环的战略思想。“对内开放就是改革”(邓小平,1993),经济问题则是全面改革中的重中之重,必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通过“计划+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协调,健康发展。

在处理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上,我国一方面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邓小平,1993),另一方面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由此,我国对外经贸迅速发展,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循环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为了有效防范经济过热带来的风险,党中央坚持以外促内是手段和途径,发展国内经济是根本目的之战略方针,及时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确保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成功地改变了经济的落后状况,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升。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巩固,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开始逐渐深入对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均GDP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0多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0000美元以上。按不变价计算,2020年GDP相对1978年以约40倍的增量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从内外循环的融合进程来看,该时期我国的经济循环体系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 内循环对接外循环的探索阶段(1978—1991年)

对内改革始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确立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的迅速提升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在原材料、消费市场和劳动力等三方面准备好了条件,乡镇企业随之蓬勃发展。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型,市场主体被激活,人民的创造力得到更好的发挥,资源和要素的凝固僵化状态开始被打破,由此,经济内循环的活力被迅速激发,同时也迫切需要外循环为此提供助力。如何使内循环充分对接外循环?探索在逐步进行。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城市被确立为经济特区。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起,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1990年,决定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自此,点(经济特区)—线(沿海港口城市)—面(经济开放区),对外开放格局领域渐宽、层次合理。得益于此,我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进出口依存度从1978年的9.65%快速提升至1991年的32.84%(首次达到30%以上),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也双双突破15%(见图1)。

2. 内循环与外循环逐步融合阶段(1992—2000年)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基于对改革开放实践中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对于基本路线、检验姓“资”姓“社”的标准、发展经济、坚持两手抓以及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等一系列事关中国改革发

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新思路,并就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发展,深化改革。随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加速,票证制度正式取消,劳动力流动管制放松,国企、金融体制等重点领域的改革也不断推进。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和经济内循环愈发顺畅的运行使我国于1997年成功应对了外部的亚洲金融危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新浪潮也让我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进出口依存度稳定在30%—40%区间,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均于2000年超过18%(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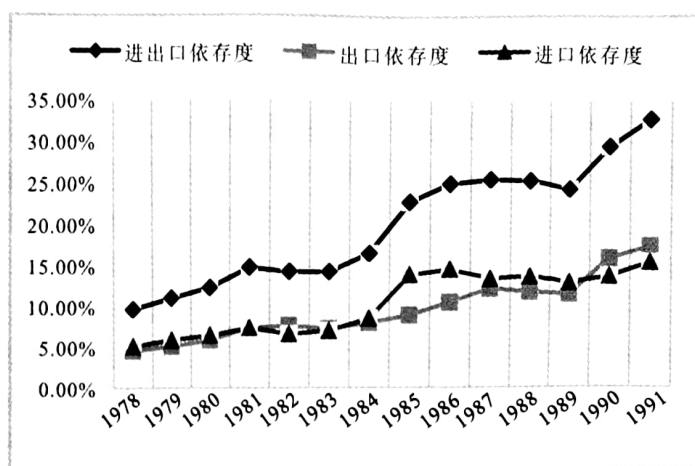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外贸依存度(1978—1991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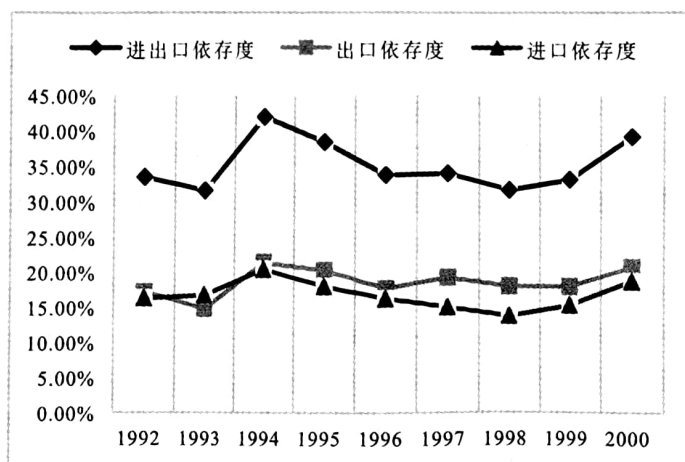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外贸依存度(1992—2000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

3. 外循环主导性带动内循环阶段(2001—2013年)

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在2002年的过渡期之后升至50%以上,并于2006年达到64%的峰值(见图3)。进出口年平均增速为16.53%(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平均增速更是高达24.15%),规模扩大6.12倍,出口量于2010年跃居世界第一,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引进外资年平均增速为7.82%,至2013年实际利用外资达1187.21亿美元。在该阶段,进出口贸易与引进外资的量和增速均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相对于经济内循环,外循环已然居于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国内GDP增速于2011年降至10%以下,2012年更是跌破8%,经济内

循环失衡、对外依赖度过高等问题逐渐显现。对此,我国“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均明确提出逐渐转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基本立足点放到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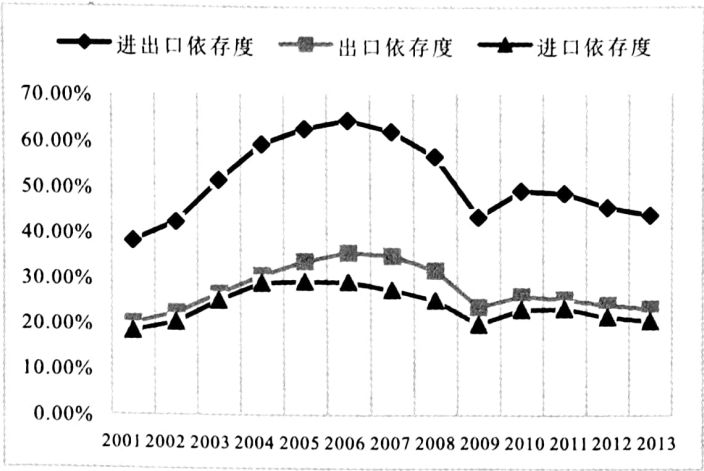


图3 我国外贸依存度(2001—2013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

4. 由外循环主导向内循环为主过渡阶段(2014—2019年)

201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降至41.06%的临界点,此后回落至30%—40%区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上下波动频繁,甚至数度出现负向贡献。而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014年达到了56.30%,超过了投资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之和,并在该阶段一直保持此主导性优势(见图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继2013年下半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于2015年推进实施这一系统工程,在“引进来”的同时探索更好地“走出去”。从对外贸易的形势和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见图5),我国此时的发展格局已然由经济外循环居主导地位转变为以经济内循环为主,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完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制约着内外循环的良性互促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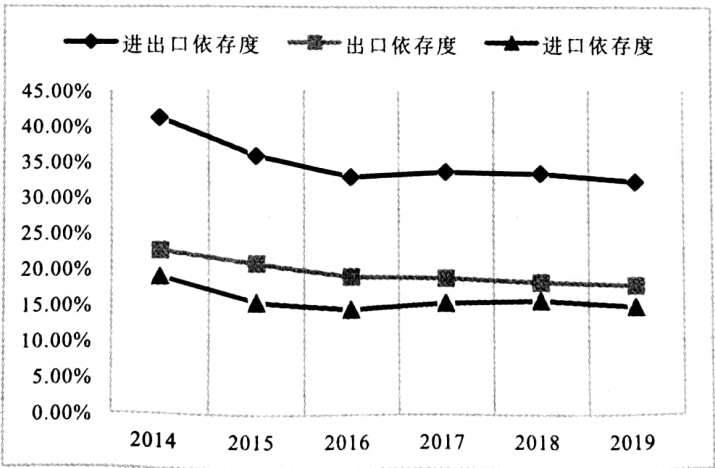


图4 我国外贸依存度(2014—201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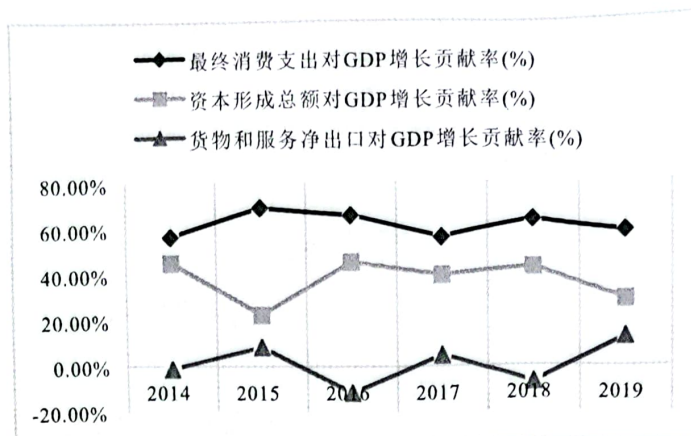


图5 我国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2014—201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发展阶段时期(2020—):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基于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体经济常态性萎靡,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动荡变革不断的外部环境;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制度、治理效能、物质基础、人力资源、市场空间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和充分条件,社会大局稳定,发展韧性强大,社会主要矛盾也已发生变化的内部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并于2020年提出积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决策。这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也是在新发展阶段打造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优势的战略抉择。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围绕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之本质特征,畅通整体经济的循环运行。供给端方面,要在投入产出上提质增效,使整体供给体系的韧性不断得到增强。需求侧方面,要将国内需求的潜力通过合理的机制运用与体系构建挖掘并释放出来,使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空间以可持续性的模式得到建设并发挥其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决不能将新发展格局理解为完全封闭的内部循环,推动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依托内需潜力的发挥,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好地联通国内和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使发展更强劲、更可持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规划了“施工图”: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有机结合,强调创新驱动,提高供给质量,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这不仅开拓中国自身的发展空间,而且助力全球经济增长。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回答了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内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外部环境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如何保持国内经济循环畅通以及怎样与国际经济循环相联结,进而谋求高质量发展之重大现实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经济循环理论的深刻理解、阐释与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运行机理

(一)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发展规律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即资本遵循连续性的内在要求(赵建,2018),完成各种形式的循环,而连续不断的循环又构成了经济周转。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运行都存在着客观上的循环,并且,在开放型经济中,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交叉并存、相互影响,国内外经济主体于双重循环之中进行着社会再生产的各种活动。这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共性现象,受经济循环的一般规律所支配,即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内部各环节互联互促、辩证统一,并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以实现再生产所要求的价值和实物的双重补偿。但是,就内外经济循环主次地位的交互替换来看,又依据由国家性质所决定的经济发展目的之不同和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内外部条件、环境的变化而各异。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经济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根本目的,这与资本主义国家追求资本增殖的直接生产目的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循环格局变化的历史,自1978年之前的“发展内循环为主,借力外循环为辅”,到改革开放“以改革激活内循环,以开放联结外循环”并一度以外循环主导性带动内循环,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发展阶段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均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基础上,于内外循环的对立统一之中探寻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而纵观世界史,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则遵循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保护内循环的重商主义和拓展外循环的自由主义之间切换政策以方便资本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这就属于经济循环的特殊规律的范畴。

(二) 一国经济良性内循环的机制

1. 经济内循环畅通的条件

一个经济体要实现内部自主良性循环,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以国内社会组织和个人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主要依靠国内经济要素和资源,在本国范围内实现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环节有序衔接,环式闭合无断点;二是整个经济体系内部商品、要素的流通必须顺畅、高效,无堵点。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实现内循环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各循环周期之间良性递进,经济运动整体充满活力。

2. 交换环节的惊险一跃是内循环的关键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W - 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由此可见,循环链上最容易出现断点之处就在交换环节,交换是商品供求矛盾最尖锐、最突出且最容易被激化的地方,是惊险一跃。然而,矛盾虽然总是突出地表现在交换环节,这并不代表矛盾的生成就局限于此。实际上,在交换环节的前后还有其他经济关系与其紧密联系。若仅片面地聚焦于交换领域的矛盾,将会仅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甚至还有可能为假象所误导。探究交换环节的问题,必须辩证统一地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刘凤义和曲佳宝,2019),并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邱海平,2021),才能把握其实质。

3. 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和数量结构是交换成功的前提

生产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交换产生的前提。商品生产者生产使用价值的目的在于实现它的价值,而价值的实现又必须通过商品交换,这就充分体现出W-G跳跃的重要意义。在市场上消费者面临多样化的商品,是否决定购买和购买哪种商品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商品交换的完成和价值的实现,就供给侧而言,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生产出来

的产品必须具有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产品的性能、质量等对消费者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以使W和G“乐意地”相互交换;第二,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必须适应社会的需求,即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产品的数量和结构必须与市场需求相吻合,否则就会出现供求矛盾,轻则导致生产者亏损破产,重则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

4. 扩大内需是内循环畅通的基点

需求端方面,投资、出口和消费是西方经济学认为的三驾马车。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出口对应的是外部需求;投资,尤其是非基建投资实际上是“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2003b),虽然会产生购买行为,但最终带来的更多是供给的增长,即具有以供给为主的“需求和供给双扩大效应”;生活消费才是终端需求。生活性消费需求的增长能促进国内社会再生产各环节更有效地次第衔接,且由此而形成的庞大内需市场也是境外高端要素、资源的“强引力场”。因此,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内需,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紧抓不放的战略基点。扩大消费内需的关键在于提升消费能力(购买能力)和提高消费意愿,所有影响这两者顺利实现的障碍都需要通过改革来清理。研究消费能力(购买能力)的提升,必须分析其背后所隐藏的经济关系。购买能力决定于收入水平,而后者又取决于收入分配关系。消费意愿的提升则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刚需消费支出占比减少,消费者降低储蓄、增加消费便无后顾之忧;二是供给侧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产出的产品既质优物美,又量足价廉,即通过高质量供给引领新需求。

5. 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是内循环畅通的保障

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2019b),是流通领域的“空间规定”(马克思和恩格斯,2019b),是“交换行为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由此,市场可以被理解为是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综合表现,同时,市场也会深刻影响这些活动和关系(宋则,2016)。

市场的形成过程就是各种商品内在和外在矛盾展开的过程,市场的职能或机制也是解决商品内在和外在矛盾的经济体系。生产者只有依靠市场的交换体系,才能不断实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由此形成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循环。但是,投入市场的各种产品和物质要素却未必都能顺利地通过这个循环,即可能会产生断点和堵点。尤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市场供需关系,价值规律引导生产者投下的劳动量与社会实际需要的劳动量在不断地试探、错配中相互适应,难免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相互协调,对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至关重要。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发挥市场机制的效能,保持流通渠道顺畅。因为“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接近于零,……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马克思和恩格斯,2003b)。这就需要不断突破交换在时空层面的局限,使生产和消费能够“消灭耽搁或停顿”进而“无缝连接”。即“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使流通顺畅无堵点;另一方面,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配之以政府恰当的调节,使社会扩大再生产比例协调、长期平衡。

(三)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逻辑

经济内循环各环节的闭合绝不等同于封闭,闭合是指一国内部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能次序咬合衔接,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不出现断点和堵点。封闭则是指不与外界产生任何沟通、交换与联系。经济内循环必须要具备独立闭合的能力,尤其是在特殊关键时期能够做到自我循环(李建平和刘晓航,2021),但却不能对外封闭,这也是对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上与国际经济循环互联互通的另一种表述。

1. 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和分工扩大化的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之间在贸易、投资、金融、服务等领域的联系与交往日益密切,已然形成共同体。“要知道每一个经济部门个

别地、安静地独自存在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它们全都互相依赖,既依赖遥远的国家的进步,也依赖紧邻的国家的进步以及世界市场变化无常的行情”(马克思、恩格斯,2003c)。任何一个国家在当今时代都不可能闭关锁国独自发展,必须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之中,这是历史的必然。并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国的要素和资源往往具有有限性,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也存在局限性,如果一味追求自我封闭的内循环甚至会导致竞争内卷化(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则能够突破国内客观条件的限制,更好地完成价值实现并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

2. 资本主义主导下国际经济循环的剥削本质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下,国际经济循环必然服务于剩余价值最大化。国际贸易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生产力和技术优势摄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因为“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2003a)。不仅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抢占了国际分工的中心位置,发展中国家则被迫处于外围依附状态,“纵向压榨”是当今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典型特征之一。这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被长期“低端锁定”(张兴祥等,2020),难以从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转移和攀升(刘志彪和张杰,2007),甚至一旦开始转移和攀升就会导致这些低端制造业环节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其本质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性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剥削。

3. 重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逻辑

“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马克思、恩格斯,1995)。世界市场打破了国家界限,将国与国联系起来,促进它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各种资源的交换流动,无论是生产、交换还是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在此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交织互融、辩证统一的背景下,体量庞大的内需市场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可以运用的战略资源,也是其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优势。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联系表现为:良性循环的国内经济提升本土市场的消费能力和水平—超大规模、多元性、极具潜力的内需市场产生不断增强的磁场效应—选择性虹吸全球高端资源和要素—优质的资源和要素有机嵌入经济内循环以更好地实现国内社会扩大再生产并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培育本土新兴产业“链主”突破“功能分工陷阱”—以高水平的开放重构国际价值链和分配格局—最终形成内外两个经济循环主次明确、互联互通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国内经济循环越顺畅就越能主动地融入国际经济循环,而越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又越能进一步促进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并且,加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社会主义中国也将完成从“参与者”到“倡导者”的国际角色定位的切换,主动承担起大国责任,秉持自由、包容、平等的理念,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治理新格局的建立。

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任务

(一) 同步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在经济循环过程中生产环节居于决定性地位,产品的使用价值和数量结构是顺利完成交换、实现价值的前提。当前,结构性错位不断激化我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这一侧。我国的产品在国际上频遭打压和被实施“科技脱钩”,其主要问题也依然是出在生产端。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必须始终坚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需协同进行,尽快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和质量,使供给体系的韧性不断加强。针对具体的改革任务,应分阶段采取差异化的对策和措施。在去产能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柔性施

策和变通手段,通过转变思维方式,切换产品使用方式,创造新的需求,使相对过剩的供给转化为可用的供给。在补短板上,必须整合集中国内外优势资源、加大基础研发,使原始创新、基础创新和科技创新取得持续性的突破;积极培育技术转移机构和创新人才,加速原理向技术的转化;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生产基地,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有机融合(洪银兴和杨玉珍,2021),将先进生产技术尽快转化为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和供应能力。

体量庞大的内需市场既是内循环的基础支撑,也是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战略工具和手段。需求侧,投资要向基础设施、公共民生等领域拓展,优化结构与提升效率并举。同时,更重要的是强化消费支撑,既要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又要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推动消费升级。第一,更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要因地制宜,多策并举,多管齐下,统筹规划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扶持企业发展吸纳就业的同时积极孵化创业,协同开展高校职业规划教育与社会在岗培训,不断优化面向社会的就业服务与针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以兼顾就业质量与就业增速。第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税制,并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王艺明,2017),利用国有企业来支持偏向劳动者的分配安排(李帮喜等,2020),压缩贫富差距,优化居民收入结构,加快形成“中低收入群体小、中等收入群体大”的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第三,建立和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在提高社会保障服务质量的同时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改善人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结构,提升消费意愿;第四、秉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与扩大消费相结合的理念,坚持健康消费、绿色消费和安全消费的导向,在培育新型消费的同时提升传统消费,扩大节假日消费并加快发展服务消费,打造区域消费中心与完善城乡融合消费网络协调发展,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升。

(二) 消除市场的物理性障碍和制度性障碍

保障经济循环的有效运行,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合理流动必不可少。就我国经济运行的现状而言,生产要素的流动已经大为改观,为了适应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必须进一步突破阻碍各类要素合理流动的物理时空障碍和制度性障碍。

继续大力发展交通运输是突破物理时空障碍的关键。近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覆盖广度和通达深度不断提升,运输服务质量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但是,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交通网覆盖水平仍需提高;交通治理因运输体量庞大、情况复杂而难度较大;交通运输领域污染防治水平还需提升;国际运输便利化程度仍需继续提高。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交通应更注重创新驱动、质量效益和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综合运输大通道、快速网与干线网,层递构建并持续完善,拓展通达广度;区域性铁路、沿边抵边公路和“四好农村路”,持续建设并不断加快,加强通达深度;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及高速公路环线系统,有序推进并完善配套,提高区域交通一体化水平;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对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设并提高服务水平;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技术,加快开发与应用,推进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邱铁鑫,2019)。以此,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在支持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完善面向全球的运输服务体系。

深化体制和机制改革是突破制度性障碍的主要手段。首先,以提高要素流动的自由度和流向的合理性为导向,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我国要素市场相对商品和服务市场发育滞后,短板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方面对要素流动的障碍、市场化配置范围仍较狭窄以及价格的形成机制和传导机制有待健全等方面。这不仅限制了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且极易在经济内循环中产生堵点。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既要持续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也要分类施策、循序渐进。土地要素重在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和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劳动力要素方面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社会化职称评审和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促进其自由有序流动;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需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的同时提升市场活跃度;技术要素市场重在完善产权制度;数据要素需要尽快界定其产权性质,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次,以消除市场区域分割为主攻点,深化行政制度改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更关注局部利益的“行政区经济”(刘君德和马祖琦,2016),不仅妨碍区域协调

与合作,而且会导致无序竞争和市场隔离,因而是统一市场建设与优化资源配置的障碍。必须从中央到地方统一协调,共同努力,从观念和目标导向入手深化行政制度改革,加快政府向公共服务型转型,从制度和机制上促进各地等高对接,从而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三) 加快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在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同时,深程度、高质量地联结国际经济循环,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联结方式,开放水平和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循环互联互通的效果。

2020年,全球除我国以外的主要经济体对外贸易全面下滑,而我国对外贸易不仅实现正增长,且规模和国际份额均创新高,更加稳固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但是,就高水平对外开放而言,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第一,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开放水平差距较大。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开放格局依然明显。金融、资本、服务等高层次国际流动与交易的世界影响力普遍弱于低层次的商品贸易。第二,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层次与欧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第三,国内相关制度、规则、标准等与国际衔接度仍需提高。第四,扩大开放过程中的国家安全保障能力仍显不足。对此,首先,政策上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并不断完善同方向延伸的交通网布局。尽快出台一系列提升金融、资本和服务等领域高水平开放的有效措施。促进各地区、领域对外开放的平衡发展。其次,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经贸活动通行规则,加快形成新的基本规则和制度体系,使开放向境内延伸、拓展(王宝珠等,2020)。同时,从关税、负面清单等方面入手,不断优化经贸环境、改善制度条件,促进国际高端要素、资源、商品等向内流动。再次,鼓励、支持本土优势企业“走出去”,整合外部资源,重新调整全球产业链格局。最后,完善一系列涉外经贸法律法规体系和从预警防范、纠纷解决直至风险救济的体系化保障机制,有效保护我国经济主体在海外的利益和国家安全。

六、结语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深刻揭示了一个经济体内部实现经济顺畅运行的一般条件和客观规律;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观点和阐释,则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国际经济循环的逻辑发展主线。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马克思经济循环理论的深刻阐释与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而实现一国经济内部的良性循环则需要:一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环节的有序衔接,环式闭合无断点;二是保持整个经济体系内部商品、要素的流通顺畅、高效,无堵点。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框架,针对我国供给与需求之间结构性错位的矛盾,应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注重需求侧管理;为保障国内经济循环的有效运行,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必须进一步突破阻碍各类要素合理流动的物理时空障碍和制度性障碍;对外开放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联结方式,应从促进对外开放的平衡发展、境内延伸、外部整合、权益保障等方面同时着手,不断提升开放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4页,第117页,第3页。
- [2] 董志勇、李成明,2020,《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溯源、逻辑阐释与政策导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第47-55页。
- [3] 洪银兴、杨玉珍,2021,《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经济学家》,第3期,第5-14页。
- [4] 魁奈,2017,《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晏智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213-241页。
- [5] 李帮喜、夏锦清、曾嘉庆,2020,《技术结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卡莱茨基学派视角的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第3期,第3-18页。
- [6] 李建平、刘晓航,2021,《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有科学理论思维》,《当代经济研究》,第1期,第10-12页。
- [7] 刘凤义、曲佳宝,201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于供求关系分析的比较——兼谈我国供给侧结

- 构性改革》,《经济纵横》,第3期,第8-15+2页。
- [8] 刘君德、马祖琦,2016,《中国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哲学思考》,《江汉论坛》,第8期,第5-9页。
- [9] 刘志彪、张杰,2007,《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第39-47页。
- [10]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0页,第138页,第538页,第239页。
- [11] 马克思、恩格斯,20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53页,第127页,第192页,第714页。
- [12] 马克思、恩格斯,2003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4页,第265页。
- [13] 马克思、恩格斯,2003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90页,第142页。
- [14] 马克思、恩格斯,2003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39页。
- [15] 马克思、恩格斯,200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56页。
- [16] 马克思、恩格斯,2009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26页,第626-627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2009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2页,第35页。
- [18] 马克思、恩格斯,2019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4-460页。
- [19] 马克思、恩格斯,2019b,《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3页,第227页。
- [20]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16页。
- [21] 毛泽东,199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6页,第380页。
- [22] 蒲清平、杨聪林,2020,《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第24-34页。
- [23] 邱海平,2021,《关于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的几点认识》,《当代经济研究》,第1期,第14-16页。
- [24] 邱铁鑫,2019,《新时代“交通强国”战略的理论探析》,《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58-62+92页。
- [25] 宋则,2016,《马克思市场学说研究》,《财贸经济》,第11期,第18-33页。
- [26] 王宝珠、王利云、冒佩华,2020,《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理论与实践——兼析“制度型开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第6期,第80-90页。
- [27] 王艺明,2017,《经济增长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经济研究》,第11期,第27-42页。
- [28] 习近平,2020,《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第21期,第40-10页。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页。
- [30] 赵建,2018,《马克思论生产连续性的重要性——基于〈资本论〉的理解》,《中国经济问题》,第4期,第3-11页。
- [31] 张衍,2017,《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原理与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第5期,第58-71页。
- [32] 张兴祥、庄雅娟、黄明亮,2020,《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镜像与突围路径研究——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视角》,《人文杂志》,第11期,第72-82页。

New Dual-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CHEN Xiaofeng¹, QIAN Chong¹²

1.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2.Wenzhou Business College, Wenzhou, 325035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dual circulation” is an innovative strategy and guiding thought to the mid-to-long-term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which allows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s to reinforce each other, with the domestic market as the mainstay. It is propos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 its core, with a comprehensive review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clarify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as well as to identify its goals and tasks, in order to provide practical tactics fo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Key Words:** economic cycl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Marx’s theory of reproduction

[责任编辑:王艺明][校对:王艺明]

中国经济问题

双月刊 (1959年创刊)

2021年11月 第6期 (总第329期)

主管单位 厦门大学

主办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编辑出版 《中国经济问题》编辑部

电 话 0592-2181474

地 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422号

邮政编码 361005

电子邮件 ces@xmu.edu.cn

网 址 http://ces.xmu.edu.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5-1020/F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0-4181

邮发代号 国内邮发 34-3
国外 BM-545

国内定价 50.00元/册
300.00元/套

国内发行 厦门市邮政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市399信箱)

ISSN 1000-4181



封面设计: 厦门无忧印业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厦门市竞成印刷有限公司